watch | 上证观察家

企业分配不公是和谐发展的“隐形炸弹”

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无论是对企业自身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对国有企业来讲,分配不公不仅压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了少数经营者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借口;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则容易侵犯职工权益,引发劳资冲突,导致企业乃至社会的不稳定。其中隐含的经济社会风险值得全社会密切关注。

□李长安

收入分配不公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近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特别指出,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是危害国有资产安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潜在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与国有企业相比,其他类型企业的内部分配不公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按说,在国有企业内部,工会组织比较健全,职工的集体谈判能力较强。不过,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为了解决经营者激励约束问题,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经营责任制,经营者在赋予更多责任、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其收入也大都采取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方式。可是,在“所有者缺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工会组织的职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管理层就占据了主动的地位,广大职工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薪酬安排。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变得不可避免。据有关部门不久前对上海部分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集团的正职经营者,最低年薪为20万元左右,经营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大约是高收入的一线职工的10倍左右,是一般收入一线职工的20倍左右,是低收入一线职工的30倍左右。显而易见,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超过我国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种企业内部分配不公的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由于许多非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很不健全,职工的谈判能力更弱,而职工工薪的安排基本上就是由老板说了算。在一些地方,职工工资水平低下、缺乏社会保障、拖欠工资的问题仍很严重。一般职工与企业老板的收入相差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现象屡见不鲜。以农民工为例,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农民工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工资还经常被拖欠。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许多企业经营者早已赚了个盆满钵满,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些还登上了各种各样的财富排行榜。

我国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可以从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数字上得到印证。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与全总对1998-2001年职工收入情况调查相比,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增加了28个百分点,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职工增加了14.6个百分点。调查的万名企业职工2004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0901元,仅为同期全国城镇社会平均工资的68%;万名职工2005年4月份的工资收入调查中,月收入在750元及以下的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34%。这表明我国低收入职工群体数量正在扩大。

与职工低收入阶层不断扩大的事实相比,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却是节节攀升。两者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根据沪深股市1000多家上市公司最新披露的年报显示,2006年,上市公司给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薪总额超过26亿元,高管个人年薪最高的达到171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自1998年高管薪酬得到披露以来,高管薪酬一直持续上涨,而2006年较上年又有大幅增长。2006年度,上市公司年度报酬总额平均为236.70万元,较2005年的176.13万元上涨了34.39%;前三位董事报酬总额平均为73.38万元,较2005年的58.62万元增长了25.18%;前三位高管报酬总额平均为82.24万元,较2005年的64.09万元上涨了28.32%。这个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去年国民经济10%左右的增长率,也高于全国职工工资不足15%的增长率。

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无论是对企业自身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对国有企业来讲,分配不公不仅压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了少数经营者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借口;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则容易侵犯职工权益,引发劳资冲突,导致企业乃至社会的不稳定。其中隐含的经济社会风险值得全社会密切关注。

对于企业内部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规定,力争引导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朝着良性的轨道上发展。比如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最近就规定,一线职工未增加工资的,经营者工资也不能增加;经营者工资超过一线职工一定倍数的,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不能低于经营者工资增长幅度。除了政策干预之外,企业内部也应该把员工持股计划放到和经营者激励计划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经营者与职工平等的激励约束机制。此外,还应该强化工会的作用,增强职工的谈判能力,这也是弥合企业内部分配不公的有效手段。

利用“刘易斯拐点”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

□邓聿文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人口红利,在经济学界这已是一个共识。

但目前这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

劳动力的这种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由此来看,经济增长本身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现象现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比如,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2004年前的10多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只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长100多元,近两年的工资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种种信息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初等劳动力已经从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将来有可能出现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刘易斯拐点”已初见端倪。

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式的变化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一方面会改变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不得不寻找高素质的劳动者并为此改善雇佣条件,提高工资水平,劳动者就会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改变目前雇主和劳工之间过于不平等的地位。另外,这也是调整中国户籍制度的机会。以前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减轻城市就业者的压力。

另一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使得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因此,企业特别是政府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挑战,某种程度而言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对企业来讲,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企业自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企业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些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然而,企业能否得到这些正确的市场信号,就得看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生产要素的价值。

总之,面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渐消耗的现实,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工资集体协商须强化工会独立性

□王平

目前,在工资分配方面存在着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有的单位效益年年提高,职工工资却不见增长;有的单位即使提高工资收入,却只提高管理者的,仍然没有职工的份。就此,5月14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在天津表示,中国将力争在未来5年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我国传统的企业工资确定方法是,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别于此:工会或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集体协议。工资集体协议与集体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利于缩小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维护一线职工的权益,使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提高相适应,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有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我国推行这一制度依然面临诸多障碍,要想使工资集体协商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清除这些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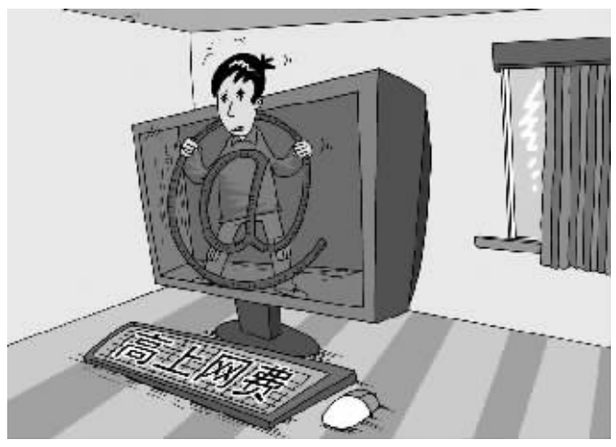
工资集体协商的职工一方一般由工会代表,未建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民主推举且半数以上同意的代表担任。根据规定,协商双方享有平等的建议权、否决权和陈述权,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过激、威胁、收买、欺骗等行为。职工代表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企业不得对其采取歧视性行为,不得违法解除或变更其劳动合同。

但是,我国工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陷,即它的独立性比较弱,并且其代表性常常难以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同。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用人单位掌握着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及其代表有没有与单位领导层谈判的勇气是值得担忧的。而且,在不少单位尤其国企中,工会领导层多是由上级任命或单位领导变相任命的,如果由他们代表职工同管理者协商,他们首先考虑职工的利益还是考虑自己的饭碗?事实上,截至目前,我国许多单位的工会都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工资谈判涉及相应的专业、法律、政策、谈判知识,现在的工会干部能否胜任这一角色?

显然,要想真正使工资集体协商能够切实推行下去,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确保工会领导由职工选举产生,并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我维护职工利益,谁维护我的利益”的问题,确保工会的独立性。同时,强化对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的职工代表的保护力度,避免他们因参与工资协商而遭到打击报复。

上网费过高是对民众福利的蚕食

□陈军华



今年“5·17”是世界电信日和信息社会日。世界银行最新发布《中国的信息革命》的报告显示,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人均收入水平的1%,而中国的比例超过10%,是发达国家的10倍,也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8%的平均水平。

一般情况下,某个产业在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由于用户少导致成本高,相关收费相应也会比较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国际电联最新的报告预测,到2007年末,中国的宽带用户将达到5700万户,而美国将只能够达到5400万户,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宽带用户最多的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电信市场。

面对世行发布的报告,信产部的王立健表示,有关数据是站不住脚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剑秋指出,世行报告的统计不科学、不严肃,报告不应以“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作为考量标准。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且越来越低。然而,就在他们对世行观点进行驳斥的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做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惊人的决定:印度政府宣布将在2009年向所有公民提供2Mbps的免费宽带服务。

印度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推动宽带的普及,使民众更便捷地从宽带中获取信息和咨询,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加快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印度的经济实力落后于中国,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2006年7月修正后的数据),名列世界第四位,而印度为0.7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但是,印度把为国民提供宽带服务当成了一项公共产品,故而不遗余力地去推行,而我们的这项服务则是商业化的,这种商业化由于竞争的不充分使得民众难以享受到竞争带来的实惠。

如果说印度向国民免费提供宽带服务的做法是为国民增添了一项公共福利,那么,我们过高的上网费实际上是对民众福利的一种蚕食。当然,就中国国情而言,由政府提高宽带上网服务未必现实,但是,降低收费标准总不难实行吧。相关数据显示,美国上网费只占收入的0.49%,韩国只占0.08%,这种支出在收入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倘若我们的上网费在收入中占比如此之低,宽带的普及速度无疑将进一步加快,惠及更多的民众。

应该认识到,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对信息和咨询的掌握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华尔街日报》曾发文指出:宽带带给我们最大的经济影响将是最难以计量的——它充当了我们在离线时所有种种行为的催化剂。当上网费用处于较高的水平,必将有许多收入较低的人失去通过网络获取相关信息和咨询的机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我国的互联网已经形成令世界感叹的规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月23日发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其中,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占到网民总数的75.9%。网民超过中国人口的10%,意味着互联网即将步入更快的增长期,同时,也为大幅度降低上网费用提高了契机。

中国网络垄断格局所导致的上网费用过高,其实是对国民福利的压缩和蚕食,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活竞争,降低上网费用,使国民更方便地享受互联网服务。

谢国忠实践了

□诸葛立早

谢国忠成为公众人物,按照他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得益于那张“乌鸦嘴”。确实,他曾在2003年就开始唱空内地房市(尽管他供职的公司在2006年还大举进入陆家嘴高档住宅区),在上证综指2500点时就开始唱空内地股市(尽管上证综指后来冲上了4000点),但其先见之明还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一位同事当时听了谢国忠的“房价要跌”的预测,一直“按兵不动”,所以对谢至今还耿耿于怀,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谢国忠近日又成为新闻人物,则得益于他的一个“宣示”,将组建一个私募基金。据称,他对自己操作一只基金一直很有兴趣,当初在大摩时,就多次流露过想自己参与或创建一只基金的想法。但这一想法并未完全得到大摩认可。谁知过了没几天,谢国忠又出来辟谣,说这是误传。目前只是帮一些身边志趣相投的朋友做一些投资,还没有筹组私募基金的必要。因为有一帮朋友有些闲钱,而且热衷于投资,所以就帮他们做点事。好事者说这是“自我炒作”,其实未必。因为搞一个私募基金远不是“张嘴”就可了得的。烦着呢!

无论如何,对谢国忠说来,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说其“下海”,不准确;说其“实践”,恰如其分。依我之见,谢国忠是个“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公司门。他的履历颇为简单: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世行的五年时间,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1995年,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担任企业财务部的联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在国内低层的实际岗位上“摸爬滚打”,其经历似乎还是空白。所以,清议先生评论谢君时,往往以此“开涮”,比如,对谢国忠有关房市的议论不着边际,清议先生云,“谢忽视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改革背景,该等背景决定了人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通过非市场的实物分配方式获得住宅,只能通过市场方式购买住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同样被他忽视的还有,最近20多年,是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婴儿潮”出生人口陆续步入生育高峰的年份,其中部分家庭的子女已开始步入独立生活甚至成家立业的阶段,加上最近10年来每年由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接近2000万人,由此形成持续旺盛的住宅需求增长,以至于住宅竣工面积的增长长期落后于销售面积的增长。当然,国内住宅市场供给短缺的现象更多地表现在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中低价住宅领域。平心而论,清议先生抓住了谢君的“软肋”。

“首席经济学家”投身实际工作,这是值得关注的。左小蕾女士说,敢做“乌鸦嘴”其实是经济学家应有的精神境界。我们要格外关注不断积累的风险,市场要随时准备遭遇经济学家“乌鸦嘴”的警示。切不可以因为“狼来了”多次被阻截,且没有造成巨大损失而掉以轻心。谢国忠实践了这种“警示”,相信会更贴近投资者实际,更有“切肤之感”吧。

股市分流居民储蓄与负利率有关

□冯光明

中国人民银行5月13日公布的2007年4月份金融运行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440亿元,同比少增133亿元。其中,居民户人民币存款减少1674亿元,同比多减2280亿元,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增加606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1至4月股市的上涨使得居民存款进一步流入股市,股市分流资金效果明显。

而股市开户数量的大幅增多印证了这一推论。居民储蓄流向股市,引起市场分析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居民储蓄是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持续减少,对银行的经营稳定性会形成一定冲击。但是,剔除股市火爆的因素不谈,居民储蓄向股市分流何尝不是银行自己造成的呢?

今年3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3.3%,通货膨胀压力在增加,而目前银行1年的定期存款利率仅为2.79%,扣除20%的利息税后仅为2.232%,也就是说,用名义利率减去名义通货膨胀率后,实际利率为负值。如果把钱存在银行里,得到的利息还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更何况还有一个利息税?在存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再对利息征收所得税,实际上是对存款人双重征税。

我国存贷利息差也非常大。从1996年5月到2002年底,人民银行多次调整存贷款利率,期间的平均存贷利差下限在1.63%-2.95%之间,大都高于2.00%,而1997-2003年,美国工商贷款中的极低风险贷款的平均信用利差仅为0.93%。这也是导致我国居民储蓄分流的一个原因。过去之所以分流现象不明显,是由于我国资本投资渠道少,加之股市不景气,储蓄无路可去。如今股市的繁荣正好为储蓄分流提供了一个契机。

笔者认为,对股市分流居民储蓄大可不必担忧,这有利于缓冲银行系统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的压力。2005年以来的进出口顺差和大量游资进入银行体系导致的存款增加,以及我国宏观调控下的贷款紧缩,使得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加大,银行系统饱受“流动性相对过剩”的困扰。有专家甚至建议,把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活期存款利率都下降为零,来阻止存款的快速增加。如今,股市的繁荣分流走部分储蓄,等于帮助银行减轻了压力。

作为银行自身,也应改变收入过分依赖利息的局面。目前,利息差收入占国内银行机构主营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四大商业银行平均在90%左右,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在80%左右,而国际上实力雄厚的银行50%以上的利润都来源于中间业务。银行如能够早日摆脱对利息的过于依赖,它对居民储蓄向股市的分流就不会如此“敏感”和担忧。

过低的存款利息、存贷款之间的巨大利息差和利息税的现状,是促使居民储蓄向股市分流的根本动力所在,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应该以此入手,即逐步缩小存贷款利息差,取消利息税。这不仅有利于储蓄户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促使消费、拉动内需,同时,避免因储蓄存款下降过快而对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和持续性造成冲击。实际上,对于取消利息税,银行界的部分有识之士也表示同意。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现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取消的时候了。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持相同观点。

有一点是肯定的,银行不能一方面坐享存贷款利息差的红利,一方面用负利率留住居民储蓄。这不仅不符合逻辑,本身也是一种不公。